

邓小平的政治肖像

现实主义者邓小平

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

邓小平的发展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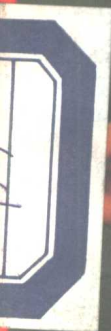
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

HAI WA
DENG XIAO PING
YAN JIU

《海外邓小平研究》编译组
山西经济出版社



海外邓小平研究



海外邓小平研究

主 编 冷 溶
副主编 俞晓秋

山西经济出版社

〔晋〕新登字 4 号

海外邓小平研究

冷溶 主编

*

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 11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经济委员会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375 字数:146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

ISBN 7-80577-525-7

F·525 定价:4.30 元

序 言

1992年2月，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不辞劳顿，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几个城市，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这些讲话，极大地鼓舞全党全国人民，中国随即掀起改革开放的又一新高潮。党的十四大坚决地贯彻了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确立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这一切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邓小平再次成为世界注目的中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巨大成功，被誉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始终成为世界关注的政治家，在国际上掀起了一阵阵“邓旋风”。1978年和1985年，美国《时代》杂志两度评选他为“世界风云人物”，许多著名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由世界各国青年组成的“国际村”，破例接纳年逾八十的邓小平为“名誉村民”。英国的培格曼出版公司连续出版两集《邓小平文集》，收入《世界领袖人物丛书》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前苏联、波兰等等，争相出版邓小平的著作。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专题文集，在香港一上市便成为最抢手的书籍而被抢购一空。

邓小平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在于他在中国现代化建设

和改革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十几年来，中国以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左右的速度发展，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归功于他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也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兴趣。他因坚持真理而“三落三起”，而每次奇迹般的复出，都使他更得人心，影响深远。他不但是位出色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军事家。在战争年代，他作为总前委书记，曾指挥过气势恢宏震撼中外的淮海战役。他对中国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邓小平鲜明生动的性格特征也是引起人们兴趣的原因。他是一位具有辩证思想方法的灵活的政治家，又是公认的最坚定最讲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位战略家，善于站在全局高度，观察问题。他又是一位出色的实干家，注重求实，常常抓住关键环节，果断地应付复杂局面，最具创新精神。他善于抽象、概括，系统阐发，以朴素凝炼的语言表达深刻的哲理，具有哲学家的气质。他乐观、开朗、豁达、大度，对中国的未来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正因为这些原因，国际上许多政治家、外交家、著名的记者、作家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写下了许多有关邓小平的传记、回忆录，思想研究的文章和专著，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邓小平的生平事迹、思想品格，并涉及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别是当前改革的广泛领域。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其次是欧洲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有许多新颖独到、很有价值的见解。

党的十四大要求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宣传和研究邓小平的生平、思想，是理论界的重要任务。正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属于国际性的政治家，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把海外对邓小平的研究情况和成果及时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更好地宣传研究他的生平、思想，是有帮助的。现在，中央有关宣传部门的同志编辑了《海外邓小平研究》译丛，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做了有意义的尝试，愿它为研究邓小平思想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海外邓小平研究》译丛编译组

1993年1月

目 录

序言	编译组	(1)
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	〔日〕小林弘二	(1)
邓小平时代的特点和意义 ...	〔日〕冈部达味、毛里和子	(12)
邓小平的发展战略	〔日〕天儿慧	(20)
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到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	〔日〕小林弘二	(31)
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美〕马克·布莱彻	(59)
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	〔俄〕B·Φ·费奥蒂斯托夫	(74)
后社会主义：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美〕阿里夫·德里克	(80)
邓小平建立新型社会主义法制的和平革命	〔美〕张大卫	(98)
邓小平路线姓社不姓资	〔香港〕李玉	(116)
深圳造“社会主义的香港”评议	〔香港〕李谷城	(124)
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	〔日〕和田武司	(131)
邓小平——当代中国最大的实力人物	小川平四郎	(140)
现实主义者邓小平	〔日〕和田武司	(149)
邓小平的政治肖像	〔俄〕M·雅科夫列夫	(162)
索尔兹伯里笔下的邓小平	〔美〕索尔兹伯里	(175)

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

〔日〕小林弘二

1972年逝世的埃德加·斯诺的遗著，定名为《革命、再革命》（英文名为“The Long Revolution”）。作为最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国人，斯诺与他遗著的题目是相称的，他确实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向世界介绍“革命、再革命”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事业。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和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革命还在继续。毛泽东在晚年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名义做了理论上的探索。

既然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共产主义尚未完全实现之前革命就没有完结。关于这一点，在共产主义者看来恐怕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却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当作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否定了。不仅如此，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恰似同毛泽东时代的目标截然相反。与其继续革命即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如首先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政权

* 本文译自宇野重昭、小林弘二、矢吹晋合著的《现代中国的历史》（1981年日本有斐阁出版）一书，《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是小林弘二撰写的该书的结束语。

的基本观点。

战争危机和继续革命

今天我们回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可以留下深刻印象的，那是“革命、再革命”的时代。而且在不断提出革命的背后总存在着战争的危机。至少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了这种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发生的朝鲜战争，给中国的国境线造成了威胁。此后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中国仍一直感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侵略的魔掌有时会伸向国境线，而且现在美国还占领着中国的领土台湾。

然而，威胁中国国境线的，不只是美国。中国对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似乎也一直抱有戒心。而且在 60 年代，中苏关系处在全面战争的边缘。

在对外摩擦升温，强烈地意识到战争危机依然存在的时候，毛泽东大声疾呼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并谋求保持群众运动的高涨。尤其在决心同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时候更是这样。

1958 年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通过下令炮击金门和马祖观察美苏的态度。同时高喊“人民公社好”宣传了“共产风”。1965 年和 1966 年在美国轰炸北越已威胁到国境线期间，毛泽东在不改变同苏联对抗的情况下，发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号召。

当毛泽东以存在战争危机为背景，号召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前进的时候，过去处在敌人重压下的延安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已深深地投影到他所倡导的理想社会中。“文革”前夜，根据《五·七指示》“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毛泽东强调消灭所谓三大差别的时候，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间，我们在各抗日根据地不就是这样干的吗”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前一段内容的补充。

毛泽东的公社设想，常常以延安时的体验为基础。他的公社理论可以说就是根据地公社理论。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据地公社中，领导者（党）同被领导者（群众）之间的理想关系（群众路线）是前提条件。坦率地说，这同巴黎公社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

似乎可以认为以战争危机感为背景，一心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在“战时共产主义”的状态之中。在危机状态中追求无止境的平均主义。毛泽东对根据地时期的“供给制”（发放实物制）一直怀念不忘。

然而，对毛泽东以战争危机为背景提出的“继续革命”，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并不总是赞同的。不仅如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解放后的路线斗争中，存在着“现代化”和“正规化”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之间的对立。当“现代化”被作为同“正规化”是一整套来理解的时候，就能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但是这里所说的“正规化”，意味着是从“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即延安方式中来的“正规化”。其中包含恢复社会主义正统性的意思。

追求延安式平均主义的毛泽东，依然认为“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1967年18条指示）。然而，党内某些负责实际工作的

领导人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般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常常阉割毛泽东的指示。每逢这种时候，毛泽东都进行忠告，但不久，“修正主义者”、“官僚主义者阶级”之类的谴责之声接踵而至。毛泽东的谴责并非都是错误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放松对延安式平均主义的追求，修正“现代化”和“正规化”路线的轨道时，经常可以看到机构臃肿，党员和干部追名逐利的现象。

毛泽东反复提出防止党员和干部变成修正主义的问题，而且开展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群众斗争。毛泽东想通过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大民主，但是在极度紧张状态下的揭发斗争往往会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揭发检举隐藏在人民内部的敌人的逻辑，很容易产生恐怖。在毛泽东的晚年，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成了牺牲品。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甚至周恩来都被当作党中央的“修正主义者”而受到谴责。起码从结果上看，与20年代和30年代不断进行肃反的斯大林如出一辙。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背景

由于中苏对立的再度激化，1969年“战时共产主义”的紧张程度达到了极点。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亲自演出了一场大的逆转剧，提出改善中美关系，开辟了建交的途径。虽然毛泽东经常说，不要害怕战争，沃土变荒原回延安就是了。然而，经历过“文革”惨剧的今天，无论如何也要避免那种悲惨的结局。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毛泽东再一次赢得了主动权。然而，他虽然能够摆脱战争的危机，但却没能打消继续开展革命斗争的念头。

当中国民众被从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心中可能闪过这样的疑问：危机也许是人为制造的吧。毛泽东

去世后，“文革”宣告结束，人民群众才放心了，这恐怕也是事实。在邓小平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背景中，就有中国群众要求和平与稳定的呼声。

作为邓小平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背景，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意识形态的毁灭”问题。具有象征性的，就是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的倡导者林彪谋害毛泽东的未遂事件。还有，在“文革”期间叫嚣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极“左”派被贴上了“极右”的标签。这种结果颇带有戏剧性。凡是离开毛泽东指示的必定是“右倾”。这样的话，没有什么“当权派”和“造反派”的差别。只是“正统”和“异端”的不同罢了。

毛泽东去世后，倡导“解放思想”的邓小平，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归结为“左倾错误”。不仅是坐标轴的大移动，而且据此从毛泽东思想（应为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思想——编者）的禁锢下解放了出来，重新取得了领导上的主动权，同时试图谋求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980年2月29日）。

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以此取代革命。过去认为必须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的矛盾，也许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会有变化。依照邓小平的说法，“物质文明带来精神文明”（1984年2月24日）。这同一贯强调思想优先和“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的价值观相反。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大胆运用市场机制和象经济特区那样推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搞活经济，提高经济效益是目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历史决议》）。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见解势必被当作“传统观念”而加以排斥。最后，甚至出现了在新的形势下，解决新的问题不能到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寻找答案的议论。可是，这同毛泽东时代相比变化是很大的。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同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改革有不少共同点，大的不同是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以前，占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被束缚在狭小的耕地上，虽然称为大陆国家，但人口和耕地大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与其说是大陆国家的形象，倒不如说中国更象一个带状的巨大岛国。毛泽东曾想让这个巨大的岛国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和“精耕细作”发展起来。促使人民公社解体的邓小平，虽然想用物质刺激来调动每个农民的积极性，但他在依靠“精耕细作”解决吃饭问题这一点上同毛泽东完全一致。为什么毛泽东采用集体经济而邓小平采用“小生产”（应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编者）呢？毛泽东的出发点，是由于贫困，不得不依靠集体的力量来摆脱贫穷的局面，而且集体化完成之后，同“小生产产生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成了毛泽东主要关心的问题。不能忘记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农业生产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多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兴建了水利和农村电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只是增产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可以说集体经济在某个时期和某些方面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但另一方面，经常维持集体劳动是困难的，这也是事实。往往集体仿佛要解体似的，因为集体的利益同每个农民的利益容易产生矛盾和对立。重视发展生产不重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只在局部范围长期存在”——编者）的邓小平认为鼓励“小生产”对发展生产有利。这种判断目前看来似乎是正确的。

这样，邓小平所指的方向同毛泽东完全相反。但是，二者依

据的共同基础使二者的发展战略具有共同点。这就是只靠种地生活是不行的。为了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必须奖励副业生产，促进农村工业化。毛泽东在写《论十大关系》和制订《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开始的大跃进时期曾对发展进行了摸索。邓小平在某些方面也继承了下来。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已成为遥远的目标，但是信奉“现代化”和“正规化”的邓小平，也不能放弃对中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

展望邓小平之后

邓小平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刚刚有些头绪，还没到评价成败与否的时候。但是邓小平时代恐怕数年后，最长10年就将结束。正因为邓小平的路线转变带有戏剧性，所以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将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正如几乎所有中国问题专家过去无法预料中国的激烈动荡一样，今天预测中国的未来也是极其困难的。这里只想简单地探讨一下与中国前途有密切联系的几个因素。

首先是国际形势。邓小平为实现本世纪末的经济建设目标，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外政策必须沿着这个中心目标展开，而且断定今后在客观上会有约二十年左右时间能避免世界大战的条件。但是每日都存在不稳定因素。中国自身也不能说没有力量均衡崩溃的可能性。现政权推行的国防现代化既是维持世界和平的稳定因素，同时也是不稳定因素。就是说沿着经济建设至上这一目标维持和平的努力本身，有可能产生妨碍实现目标的因素，这恐怕是值得注意的。

邓小平为了寻求自己的“政策的连续性”，在过去的几年里倾注很大的力量来建立接班人体制。这种体制的建立不只限于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而且与领导层的世代交替密切相关。把建立从中央和省一级进而到县一级的彻底的接班人体制作为目标。邓小平的政策能否继承下来这与在短时期内建立这种接班人体制成功与否有关。作为可以预料的困难，恐怕以下两个方面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是强行建立接班人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阻力；再一个是，激烈动荡的历史留下的“代沟”。关于后者，应附带多说几句。所谓“第三梯队”的核心，是由文革前大学毕业已开始步入党政机关领导层的一批人员构成的。但他们的下一代人中的不少人至今还留有“文革”造成的伤痕。作为他们的下一代，带有脱离意识形态倾向的技术主义者集团今天即将登台。加之同代人之间，留学苏联的一代人同留学欧美的一代人被割断，进一步加深了裂痕。同代人之间的这种隔阂会给建立接班人体制带来什么影响呢？

邓小平对经济建设的重视以及为搞活经济而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被继承，从根本来说，同群众如何理解当前日益加深的矛盾有关。在城市的企业中生产管理者阶层和工人们讲的未必欢迎改革，这是因为他们对失去既得利益的担心甚于对改善生活的期待。另一方面，扩大农村阶层间和地区间的差别，其后果不也是难以想象吗？还有，如果“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在党的庇护下进行的话，那恐怕也很难避免由于党组织和党员的参与而产生的“不正之风”和它带来的党的威信的下落。如果群众对各种各样的深刻矛盾的不满超过对改善生活的期待的话，即使邓小平直系的领导人当上了接班人，也将被迫大幅度地修正轨道。矛盾的深刻程度尽管是中国社会的活力的反映，但是政策的振幅必定

变大。

那些反对各个时期的路线和政策的势力，常常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于批判势力来说，困难的是批判的立足点放在哪里？能否提出新的政策设想？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倡导整顿“民主与法制”（如果同毛泽东的“大民主”相比，这可以叫“小民主”）的政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是由于在对“文革”记忆犹新的基础上，经济体制改革和要求民主已成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共同课题，成为历史的潮流，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已为知识界所共有。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已成为遥远目标的今天，解决“信仰危机”问题是不容易的。如果说经济建设至上和现代化至上的目标意味着承认中国落后的话，那就难免使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空的。

在矛盾日益严重，追求平均主义政策的呼声在群众中再次高涨的时候，为了寻求批判用的政策观念，也许会出现要求恢复毛泽东思想的事态（以邓小平不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为前提的议论）。

以下两个侧面的考虑可能是必要的。

第一，从长远来看，要求民主和开放的呼声今后会越来越高涨，而且恐怕共产党的应有状态（先锋党）也不得不加以改变。恢复毛泽东思想（这是作者认识上的偏差。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纠正的只是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因而根本不存在什么“恢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编者）也不能违背这个潮流。

第二，是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的愿望和搞活经济的必要性。在今天看来，这不管是怎样迫切的课题，但从长远观点考虑，毕竟是个相对的问题。从资源和环境等方面来看，一个拥有十亿人口

国家的经济，要想在数量上得到发展，制约条件是相当多的。另一方面，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总会有人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人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实行市场经济和追求经济效益，那人类到底应该追求什么？如果恢复毛泽东思想的话，也许想从毛泽东思想中的那种对现代社会的过激批判中吸取些什么。

当写完本书的时候，想简单地谈一下我们对现代中国的激荡的历史的看法。

解放后的中国，经历两次大的转变。不言而喻，即“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而且每次转变都要改写历史，同时为了证实主张的正确性，还抛出一些证据资料和有关情报。“文革”前的新中国历史，在“文革”开始后被改写成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种种罪行都被披露出来了。然而，今天在邓小平体制下，恢复了当权派的名誉，反过来声讨了“文革”派的“罪行”。

中国这种大转变，也给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以极大的影响。恐怕多数中国问题专家们或多或少都在对自己的中国观进行反思吧。我们当然更不例外。因此通过再一次用自己的眼力弄清激烈动荡的历史，重新研究现代中国的问题，这就是编写本书的动机。

今天，当我们想自主地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的时候，中国的正式见解的重复变化，还有得到手的那些从不同立场出发披露的情报和资料，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是个有利的条件。例如，关于农业合作化过程的问题，就有三种出自不同立场的正式解释，只要把这些材料互相一对照，还看不到事实真相吗？排除固定的观念，综合分析所有情报，就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